



史苑英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精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史苑英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精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苑英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精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ISBN 978 - 7 - 80745 - 187 - 7

I. 史... II. 上... III. 史学—文集 IV. 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2913 号

史 苑 英 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精选

编 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言 孙

封面设计:王斯佳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29.5

插 页:2

字 数:54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187 - 7/K · 031

定价: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崇喜

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建于1958年,迄今整整五十年。在半个世纪不寻常的岁月中,我院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建院到1968年建制撤销,是草创和早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1968年建制撤销到1978年恢复建院,我院科研和建设被迫停滞和中断;第三阶段,从1978年恢复建院至今,是我院持续发展、昌盛繁荣阶段。

我院创设之初,原是研究与教学并重的机构,设有政治法律系、工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财政信贷系、会计系、统计系、业余大学和经济研究所,隶属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领导。1959年起改为比较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再招收本科生。同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并入,并相继设立哲学研究所、政治法律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学术情报研究室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院的科研工作被迫中断,许多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作人员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科研和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至1968年底,全院除部分工作人员调市有关部门工作外,其余人员均到奉贤县“市直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劳动,被编入“市直五七干校六兵团”,我院建制被撤销。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有部分科研人员割舍不下对学术研究的独钟情愫,冒着被批判的风险,白天参加运动、劳作,晚上阅读、思索,以萤火烛光探照民族苦难的由来和前去的道路。

1978年,我院恢复建制,和共和国一道步入崭新的历史时期。此后,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我院因时、因地制宜,广纳贤才,复所建所,一方面完成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的恢复重建,另一方面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陆续建立部门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情报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信息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1992年更名为东欧中亚研究所,简称欧亚所)、青少年研究所、新闻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一批新的研究所。2003年,为整合研究资

源、加强学术交流,我院先后成立了两个跨所联合的研究院,即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和社会发展研究院。前者由世界经济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四个研究机构组成,以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为研究重点;后者由社会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青少年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四个研究所组合而成,集中研究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此外,为了培植新的学科增长点,我院大力推进跨所、跨学科的院直属研究中心的建设。截至2007年底,我院先后设立了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长三角联合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等约20个院直属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广结学缘,开展富有特色的学术活动,成为我院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我院拥有2个研究院、15个研究所和约20个院直属研究中心,学科门类齐全,机构布局合理,研究实力雄厚。到2007年底,全院在职工作人员81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640人,包括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94人。

学术研究是我院中心工作,而学术的发展总是依托学科的发展。在过去五十年中,我院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学科建设,进入21世纪以来,我院更把健全和完善学科体系视为我院科研工作的重心。目前我院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产业经济学,世界经济,经济刑法,国际关系,上海城市史研究,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研究,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城市文化,思想文化等12个重点学科,以及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创意产业,家庭学,租界、租界地等特殊地区研究,犹太学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研究,西方文学文化批评思潮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经济伦理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学术思潮史,科学哲学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城市化研究等14个特色学科。这些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集中体现了我院的研究特色、实力和优势,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回首五十年风雨历程,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尽管有过曲折和坎坷,但总的来说,我们坚持以学术为立院之本、以学术为育人之魂、以学术为强院之路,坚持厚德笃学、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发展之路,在不断强化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大力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和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自觉地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以学者的智慧积极回应改革开放时代的问题与挑战,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过程中累积起可观的思想资源和学术资源,也在这个过程中累积了一定的地位和声誉,我院因此而成为备受海内外学术界瞩目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镇,成为党和政府充分信赖的思想库、智囊团。

这套丛书以所为单位,每所一本,辑录各所在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汇编成册,既是为了纪念我院五十周年华诞,也是为了集中展示我院过去五十年的科研成就。这套丛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我院科研人员在过去半个世纪所走过的曲折而又辉煌的学术之路,凝结着我院全体科研人员在时代风雨洗礼下的智慧和良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过去的五十年我们在艰难的求索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淀了丰厚的底蕴,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些成就、底蕴和传统已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并将转化为我院全面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新智库”的强大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五十年中,我院将更加雄姿勃发,灿烂辉煌!

2008年6月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序 言

熊月之

学术研究机构安身立命的根基,一是凝聚学术人才,二是创造学术成果,归根到底在于学术。

历史研究所建所以来,除了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一直高扬学术的旗帜,崇尚学术,敬畏学术,酷爱学术,以学术为立所之本,以学术为育人之魂,以学术为强所之路。即使在“大跃进”年代,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由于李亚农、周予同、杨宽等一批学养丰厚、学风严谨的著名学者的示范作用,历史所也是脚踏实地进行研究工作,从搜集资料入手,从调查研究起步。那一箱箱精心抄录的卡片,一摞摞推敲再三的译稿,一部部功力深厚的资料书,乃至到现在还让许多学术机构钦羡不已的二十多万册藏书,都是本所重视学术的明证和结晶。从鸦片战争、小刀会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到工人运动,本所出版的众多资料书都是在建所前十年内奠定基础的,到现在仍然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历史所在 20 个世纪 60 年代,人数已超过八十,汇集了一大批出身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的优秀学者,分布在古代、近现代、工人运动、党史、中外关系等各个领域,堪称上海第一大专门史学研究机构,其学术地位举世公认。

1978 年复所以后,历史所历届领导的学术志趣、专攻领域、治学风格虽各有不同,但在重视学术这一治所方针上高度一致,承接传统,从不动摇。本所一直强调科学办所,其实质就是要按学术研究自身规律办所。改革开放,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到历史所,就是要以历史研究为中心,“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遵循这一精神,本所对外注意拓展学术联系,对内注重提高学术素养,进入重研究能力,考核重成果质量,形成了历史所特点,即“以学术为灵魂,以人才为支柱,以团队为特色,以公正为原则”。学科方面,以近现代史为重点,以上海史为特色、兼及中国史其他方面。历史所学者承担了多项国家、上海市和社科院重点项目,发表了难以确计的科研成果,包括专著、论文、工具书、译作、资料整理,在国

内外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历史学是面对过去、立足现实、走向未来的学问,很难与社会现实直接结合,不会受到市场经济太多的关照。历史学不能期望自己像法学、经济学那么热门。但是,历史学也有独特的学科优势。

首先,历史学容易将“为人”之学化为“为己”之学。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的是所学与所好分离的现象。相对说来,历史学比较容易将为人之学化成为己之学。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治史者比较容易在与圣贤的对话中陶冶情操,在观看历史的活剧中增长智慧。《三国演义》开头所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翁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沉静的历史学家,就是那把酒临风、俯视千秋的“白发渔翁”,能以学术效益赢得社会效益,以精神富有弥补物质贫乏。

其次,治史者心灵容易沉静。历史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换个角度,劣势就是优势,短处就是长处。不容易与市场经济挂钩,也就不容易受市场经济诱惑。治史者往往不懂股票,不懂期货,不懂房市,但正因为不懂,没有牛市的欢欣,也没有熊市的惆怅,其心易静,其气易顺,其虑易周,“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其成果的生命力、影响力就可能比较持久。

历史学是历史最悠久的学问,是范围最广袤的学问,是发人深思、启人智慧、引人入胜的学问,还可能是养气固元的学问。

本书是历史所五十多年来研究员的论文选编。议题所及,或古代,或近代,或都市,或乡村,或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为文风格,或以义理取胜,或以考据见长,要之,都是各人潜心研究的结晶。值此社科院建院五十周年之际,汇集出版,以为纪念。文章发表时间,覆盖半个世纪,时代的风雨在不同时期的文章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有些论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无懈可击,有些论点则已成明日黄花,为保留历史真实,今一仍其旧。即使是书中收录的新近之作,再过五十年,后来诸君重读此书,对于书中见解,心服乎?嗤笑乎?理解乎?茫然乎?吾不得而知也。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就是历史。

2008年3月18日

CONTENTS

目
录

序 言 / 熊月之 / 1

中国古代史

从管子的几篇文章来看战国时代的社会 / 李亚农 / 3

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

——中国经学史论之二 / 周予同 / 15

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 / 杨 宽 / 26

明代抗倭战争中的诗人徐文长 / 徐 崑 / 44

关于汉晋琅邪诸葛氏的“族姓”问题

——论诸葛亮与刘备的政治结合 / 方诗铭 / 57

两汉的历史转折 / 刘修明 / 68

论周礼的制订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 杨善群 / 83

范仲淹与北宋前期儒学复兴

——兼儒学、道学、理学之概念 / 罗义俊 / 93

摩尼教神“净风”、“惠明”异同考 / 芮传明 / 108

从先秦礼制中的爵、服与德数位一体诠释《缙衣》有关章旨 / 虞万里 / 123

早期儒家的“和谐”观 / 程兆奇 / 139

王学旨归与王学之革命性质 / 程念祺 / 152

中国近代史

启蒙运动与五四罢工 / 沈以行 / 165

- 孙中山和自立军 / 汤志钧 / 173
- 建党时期陈独秀研究述评 / 任建树 / 185
- 关于“六三”大罢工的几个问题 / 姜沛南 / 192
- 论晚清通讯业的近代化 / 徐元基 / 201
- 《南京条约》至《虎门条约》期间英国在上海选择居留地的
活动 / 吴乾兑 / 213
- 理解的困难与表达的偏差
——晚清中国对美国总统制的解读 / 熊月之 / 218
- 1900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不变 / 杨国强 / 231
-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 / 周武 / 246
- 东南的旗营与旗地问题 / 马学强 / 261
- 华商同业公会与中外商业关系的调处 / 宋钻友 / 272

中国现当代史

- 1957年:良机与逆转 / 李华兴 / 289
- 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 / 钱杭 / 303
- 崇“武”的审美及其蜕变
——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研究 / 金大陆 / 315

上海史

- 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 / 唐振常 / 331
- 黄炎培与穆藕初
——近代企业界与教育界携手奋斗之典范 / 陈正书 / 354
- 上海与近代都市美女视觉形象的塑造(1880-1920) / 罗苏文 / 370
- 铁门悲欢
——“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 / 郑祖安 / 386
- 几点钟打烊?
——论旧上海两界三方围绕公共娱乐场所关门时间的
交涉 / 马军 / 401

工部局与上海早期路政 / 袁燮铭 /	411
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 / 吴桂龙 /	423
清末上海教育改革之研究(节选) / 施扣柱 /	445

中国古代史



从《管子》的几篇文章来看 战国时代的社会

李亚农

《管子》这部书,非出自一人之笔,亦非成于一时之书。拿时间来说,最早的作品,可能写于战国初年;最晚的作品,可能出现于文、景之世。拿内容来说,包括了道家、儒家、兵家、医家、阴阳家以及法家的思想,而法家之说,实构成这部书的主要部分。由于这部书的内容极端丰富,涉及的方面甚多,著者暂时还来不及一一加以深入的研究,现在只从法家的作品中检出两三篇来,考察其所反映的战国时代的社会情况。

一 从《问篇》来看战国时代的社会构成

法家的一贯的思想,在于摧毁封建领主的割据势力而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自从子产开始施行这一新的方针以后,到了李悝就公开地宣布,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再经过商鞅的改革,法家的理想遂得以普遍地施行于古代的全中国。封建领主被打倒了,封建地主到处抬起头来了。

《管子》的《问篇》第二十四,既明确地在宣传李悝和商鞅的思想,又具体地反映出战国时代的社会情况。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这篇文章是很有趣的。这篇文章开头便说:

……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①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授事以能,

① 《管子》书中错简、错字、夺字甚多,若非前人辛勤努力,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校勘工作,我们便休想读懂这部奇书。今天之所以能勉强看得懂,前人的劳绩,实在值得感谢。所以每逢引用《管子》的时候,注出那些错字为某人所校正,以表彰前人的功劳,实为研究《管子》者的义务。例如这一句的(大)字,依张佩纶校,是一个衍字。无奈经过校正的字,触目皆是,若一一注出,则著者实不胜其注,而读者亦将不胜其烦;今后每逢有校正之处,便在错字、衍字之上皆加括弧(),所补夺字,则加中括号[],以志前人的劳绩,并慎重地表示著者不敢掠人之美。

则人上功；……

依靠本人和君主的血缘关系或依靠祖宗的功勋而分封采邑的时代，不但已经成为过去；即依靠血缘关系或祖上的功勋而享受爵禄的时代，亦已成为过去。战国时代的爵禄是授给有德有功之人的，官职是授给有才能之人的。

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

(君)群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

群臣有(位)莅事，官大夫者，几何人？

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

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

大夫的地位，在卿之下，士之上；要是在春秋时代，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封建领主，不用问就知道他的祖先是誰？他的大宗(卿)是誰？而战国时代的大夫，连政府都不知道他出身何处，还须要进行调查，可见他不是什么世袭的贵戚。身为大夫，不但是没有采邑，连田也没有，而只有一点俸禄，这样的大夫决不会是封建领主。就是对于这样的大夫，政府也还要仔细调查，了解他是否禄当其功，才胜其职；不能让纨绔子弟来尸位素餐，蒙混国家的爵禄。就是对于这样的大夫，也还要提高警惕，看他是否借钱给贫穷之士，而严防其笼络人心；要看是否有国家的小吏，在大夫家里担任职务，而严禁其聚集党徒。至于外人来游而客于大夫之家者，更须留心考察，一则防其私通外国，一则防其威权太盛。总之，政府要从一切方面来预防犯上作乱的行为，来制止割据势力的死灰复燃。在这种政治空气笼罩之下，不可能有封建领主的存在。战国时代的大夫，充其量，是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田宅的地主而已；或者连田宅也没有，而仅仅是领取俸禄的官僚而已。

士之身耕者，几何家？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

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

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

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帅众莅百姓者，几何人？

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

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

中外都有一些史家注意到中国历史上，似乎曾经有过封建领主时代，但奇怪的是没有武士阶级。武士阶级是封建领主的支柱，他要依靠武士阶级来进行封建割据战争，他要依靠武士阶级来镇压农民的反抗，而中国史上竟没有武士阶级，遂认

为这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在五六十一年前,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史家,曾为此而深致惋惜。他们羡慕日本帝国主义日臻强盛,在侵略战争中,每战皆捷。他们在羡慕之余,遂进一步而研究其所以然。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在每一次战争中取得胜利,乃是因为日本人能够发挥其武士道精神,所谓武士道精神,实即日本的封建余孽,武士阶级的精神——剽悍好斗;而中国之所以萎靡不振,则是由于缺乏武士道精神,在历史上缺乏武士阶级的存在的缘故。中国不欲振奋则已,如果想发奋图强,必须培养这种武士道精神。从现在看起来,这种说法虽然十分可笑,可是当时提倡此说者,却是一本正经。

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无论洋之东西,都在发生作用,尽管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各自具有其特殊性。有了封建领主的制度,而不出现领主们所恃以维护其特权的武士阶级,是不可想像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封建领主制,当然也存在过武士阶级,不过这些阶级早在两千年前就躺下去了,必须遵循着社会发展的法则去找,然后找得到他们;要不然,哪怕你费尽毕生的心血于故纸堆中,也只能做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足以见舆薪。

春秋时代的所谓士,在没有产生文士阶层以前,都是武士。这些武士大概都是卿大夫(封建领主)的小宗,或者是这些小宗的分支,即奉这些小宗为大宗的小宗。血缘的脐带把封建领主和武士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采邑的分封制又使他们有了共同的经济上的利益,使武士阶级不得不效忠于封建领主;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一种同生死、共存亡的,要割也割不断的关系。可是当着封建领主们在法家的打击之下垮下去的时候,武士阶级也跟着垮下来了,其中的一部分急难可使者便形成了官吏群。战国时代的士,已经不是从封建领主那里分得了一份土地的武士阶级,而是舞文弄墨之士,等而下之,便是耕战之士,士卒之士。

处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以帅众莅百姓者以及士之急难可使者,大概都是俊秀之士,有舞文弄墨之长,必须了解清楚,以备不时之需。士之有田宅,身在阵列者;士之非嫡长子,因能胜任甲兵,而自愿投身行伍者;以及躬亲耕种者(不问其所耕的是自己的或租借的);这些都是所谓耕战之士、士卒之士,应得到国家鼓励的人物,必须调查清楚,而加以鼓励。士之有田而不耕者,贫士之告贷于大夫以维持生活者,是否是因为怠惰而陷于贫困的?如其然,“将举以为收孥”。这样的贫而怠者,也必须调查清楚,以便加以应得的惩罚。士之有田宅,即是有了社会地位,而不见任用于国家者,必须了解他到底是为什么为政府的官吏所厌恶、而不被采用,以防其图谋不轨,扰乱治安。

没有田宅的士,当然没有资格去做武士,因为要做一个武士,必须有起码的财

富,足以自备兵车才行。有田宅而为处士,或不见使用于国家的士,当然也不是武士,因为武士是有跟随封建领主去作战的义务的,虽欲做处士而不可得,虽欲不见用亦不可得的阶级。战国时代的士,有田宅者为地主,没有田宅者则为贫士;一无所长者,只得终生做个贫士;有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帅众而莅百姓者,即可由士拔擢为吏,由吏而大夫,以至于将相。战国时代是士大夫(地主)的天下,而不是卿大夫(领主)得以恣意横行的天下了。

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

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

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

问一民有几(年)人之食也?

国家必须了解境内开辟了多少田亩?有多少农业人口?其中有多少劳动模范,足以为人民的榜样的?农民的生产力有多么高,一人耕地就能养活几个人?这是有关财政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封建领主的采邑内——具有割据性的独立王国内,是不容许国家的中央政府去过问的。在战国时代,这些问题都可以由国家来进行调查了,足证封建领主的独立王国已经不存在。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

问死事之寡,其饩廩何如?

外人之来(从)徙,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

官(承)丞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家?

如有为国牺牲的烈士的孤儿、寡妇,而尚未领得抚恤的田宅或粮食,这将影响士气,必须调查清楚而加以抚恤。地方上的助理书记之类,只尽义务而没有田宅或领取薪俸的小吏,亦应适当的照顾,以消其愤闷不平之气,以避免其敲诈为生;对于外人之移居于境内而没有田宅者,应使其有谋生之道,以防其为非作歹。这些问题都是在封建领主时代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在封建领主制度下,农奴战死,反正家中有份地,不愁孤儿、寡妇们无田可耕;而为封建领主担任书记的,大概是采邑内的小宗的子弟们,生活是有保障的;除了少数外国的卿大夫可能亡命到境内来,而一般的人民是很少有迁徙的权利的。这些问题只可能发生在封建地主时代。

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

余子仕而有田邑宅,^①今入者,几何人?

^① “田邑”的“邑”字,误,前人未校正。本篇“田宅”二字数见,则此地的“田邑”亦应校改为“田宅”。有田宅而没有邑,即有田宅而没有居民点——农奴,正是战国时代的标志。